

# 孙犁先生的“标题艺术”

——重读孙犁系列随笔

侯军

新闻标题既是特殊的“艺术品”，也是绝对的“易碎品”。一经见报，拟题者便退隐幕后。读者在标题的引导下，进入正文阅读，谁都不会去关心这个标题的作者了。因此，常年研磨标题艺术的媒体编辑们，却往往无人知晓，其“作品”也从不署名。故而，人们常说编辑是“无名英雄”，是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。这在客观上，也给我们今天研究“报人孙犁”这个课题，带来了麻烦。

新闻编辑的“主业”之一，就是拟定标题。而孙犁先生既为编辑，肯定也草拟过不少标题。可是他在战争年代办过的报刊，今已踪迹难寻；即便找到旧报，又如何断定那个标题是出自他的手笔呢？这使我们在当下，若想研究孙犁先生的“标题艺术”，几乎成了“无米之炊”。

幸好，我找到了一条“别开之蹊径”：在孙犁先生编辑自己著作的过程中，他时常利用这个机会，对原标题进行订正和修改，这不就是“重拟标题”么？当然，我们单纯去读孙犁的结集、选本或文集，是无法辨识出哪些标题是重拟的。巧的是，我此时“幸遇”两部大部头专著，一本是出版于2012年的《孙犁文集·天津日报珍藏版》，一本是由段华先生编撰的于2022年3月“新鲜出炉”的《孙犁年谱》——这两部书的编者，非常精心地比对了原题与新题，并在书中一一标注出来，这就给我一样的研究者，提供了极大便利——真要感谢这些

严谨认真的编辑们！

由此，我们可以间接地窥视到孙犁先生亲自拟题的特色和技巧。我花了几天时间，把两书中所有标明是由孙犁亲自重拟标题的篇目，一一罗列出来，进行分析和比较，并依照孙犁先生在论文中所提出的“简单、有力、新鲜”的标准，进行分类研读。虽无法窥其全貌，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，依稀看出孙犁先生的“标题艺术”——

孙犁先生对标题的第一条标准是“简单”。而他对对自己文章的“重拟标题”，正是突出体现着“简单”的原则。如原题《忆晋察冀的火热斗争生活——〈白洋淀纪事〉重印散记》，在收入《晚华集》时，孙犁改题为《在阜平》（副题未动）；《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》，在编入《孙犁文集》时被改为《婚姻》；一篇未署名的启事，原题为《本报〈文艺增刊〉将辟“创作经验”专栏，兹摘录其辟栏说明如下》，在编入《澹定集》时，被改为《〈文艺增刊〉辟栏说明》……所举数例，皆遵循“简单”的原则，不唯文字精练，意思也表达得更加明确。

“有力”是孙犁为标题设定的第二条标准。一个标题能否“有力”，必须从文章内容出发，在准确表达其内涵的前提下，增强其力度和响亮度。兹举两例，以见一斑：《吴召儿》的第一个小标题，原为“胜利回头”，在编入《孙犁文集》时，孙犁改为“得胜回头”，一字之易，力度增强。另一篇文章原题为《和青年谈谈文学和创作问题》，

显得有些平淡；孙犁在编入《秀露集》时，改为《新年，为〈天津团讯〉作》，从句式和音节上，显得更加有力了。

在孙犁的三条标准中，最微妙也最难把握的是“新鲜”二字。编辑拟题，大都追求新颖别致。在事实准确、简明有力的前提下，标题自然越新鲜越好，越出奇越妙。这是通常的理解。而孙犁在编辑文集时的“重拟”标题，针对的并非新闻稿件，而是文艺味道甚浓的散文、随笔、杂文、记事等文体，在这里，“新鲜”的内涵显然与新闻标题略有不同。在我看来，这倒正可用上他所提出的“秀颖生发”这个美学概念了。孙犁先生为书起名，就特别讲究诗意的表达，如《晚华集》《秀露集》《如云集》《远道集》直至最后一本《曲终集》等等，皆带有几分淡淡的诗意。而《书衣文录》《烬余书札》等书文的标题，则显得古雅典丽，具有浓郁的书卷气。而他为文章改题，同样

具有这种特点，如《京剧脚本〈莲花淀〉自序》在收进《秀露集》时改为《戏的梦》，成为孙犁先生“散文三梦”（《戏的梦》《书的梦》《画的梦》）的代表作。

孙犁先生晚年曾写过一篇《文章题目》，所谈偏重于文学作品的标题。他写道：“近年读文章，姑无论对内容，如何评价，对文章题目，却常常有互相因袭的感觉。例如杂文，几乎每天可以看到‘从……谈起’这样的题目，散文则常常看到‘……风情’之类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小说则多‘哼、哈、啊、哦’语助之辞的题目，真可说是‘红帽哼来黑帽啊，知县老爷看梅花’，有些大杀风景之感。当然，文章好坏，应从内容求之，不能只看题目。但如果‘千文一题’，也有违创新、突破之义吧？”（《远道集》，第142页）

孙犁先生此处所说的文学作品标题，虽说与新闻标题有一些不同，但却正可与其上述的“重拟标题”互为参照。

标题本是“文眼”之所在。孙犁先生的标题，从不花哨，从不轻佻，朴实工稳，沉静深邃，还真有点像他那双深沉纯净的眼睛。

## 菊挽墨蝉

胡西淳



拙笔，耐心斟酌写蝉。散墨，点染小朵菊花。写意，大概就是写内心意愿。凝翠

郊野景陶然，简笔见证虫花缘。清爽别有情致在，风中秋菊挽墨蝉。

他了解了许多药性、记住了很多病名和偏方。第二是《西游记》。沈从文喜欢《西游记》中那种“富于泥土气息的谐趣”，喜欢时时驾着黑云、世故、胆小、心虚、贪图便宜、处处还装模作样的猪八戒。在他眼中，猪八戒虽然缺点多，却很真实，比只能活在书生脑子里的西楚霸王项羽要可爱。第三是一部兵书。上面有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，各种火器的图说，看来很有趣味。

书中文字的济世价值和书中人物的真实性情让沈从文受到滋养，诚如他所说：“这三种书帮助我，影响我，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。”北京求学期间的沈从文为进入高等学府，大量地读书，大量地输入知识。然而他未能如愿，于是为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他拿起笔，凭借湘西生活的体

定去的。去还书，借书。”

老年的沈从文，对书的热爱俨然已经到了离不开的程度。据1975年年初成为沈从文助手的王亚蓉回忆，在沈从文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密密麻麻摆满了书，“架上全是书，桌上是书，地上堆得还是书，床上堆得也全是书”。此时的沈从文虽然伴有心脏病和高血压，但是专注于文物研究的他对工作学习的热情丝毫不减。抱着一种“古为今用”的执念，以及用文学感染“以百万计的情绪在消沉衰退的青年”的善意，他将书籍作为吸取传输知识的助手，并在家中四壁贴满了图片和字条，上面写着他从书中获得的启发。对于一名已近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，书已经成为他精神深处的强大支撑。

## 星期文库

沈从文的情感和生活之一

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，科举时代的人才选拔标准，经历了一个从“不唯分数”到“唯分数”的演变过程。唐代进士科实行“通榜”和“公荐”制度，当时录取进士不仅看考场成绩，还“采誉望”，即参考平时的才学水平和诗文名声，参考达官贵人和著名人士的推荐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“综合评价、多元录取”。其优点是确有主考官录取了许多社会上公认的高水平才士。如唐贞元八年（792年）的“龙虎榜”，就出了韩愈、欧阳詹等名士和多位后来成为宰相的著名人物；其局限是主管进士科举的考官自由裁量权过大，是否公平客观往往取决于“知贡举”者的眼光和操守；其弊端是可能出现世家大族干预录取，不够公平客观的现象，导致一些有才华的寒士落选。

自从北宋科举普遍实行糊名、誊录制度以后，完全不参考举子平时的声望、水平和作品，科场“一切以程文定去留”。“程文”即考场上的答卷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凭考场上表现出来的水平和成绩来录取，即“唯分数”选才。科举考试这一选才制度，在创立之初引起相当多的争论。北宋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里论说，州郡发解试应“必先考其履行，然后取以艺业”；而采用糊名、誊录制度后，考生“不见姓字”，对其日常行为举止更是无从考究。因而范仲淹建议重发解试条例，加入对举子德行履历的考察，并主张废除糊名、誊录制度，考察“履行无恶、艺业及第”者方可录取。次年（1044年），包拯反对废止糊名、誊录制度时指出，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，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：“或缘其雅素，或牵于爱憎，或迫于势要，或通于贿赂，势不得已，因而升黜者有矣，又何暇论材艺、较履行哉？”可见，当时包拯对维护公平的糊名、誊录制度持肯定态度。二十多年之后，北宋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欧阳修赞美糊名、誊录制度时表示：“糊名、誊录而考之，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，谁氏之子，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。”他认为，排除人际关系的干扰，完全依靠考场上表现出来的才学水平，以考试成绩论高下，是最公平的方法。北宋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担任知制造苏颂又提出“国家取士，行实为先”；而糊名、誊录制度使考官只能凭考生的文词取士，取决于考生的临场发挥而对日常德才无所考察。因而苏颂也提议废除糊名、誊录制度，改为公开考核并兼顾考生的日常品行。

北宋政坛对于糊名、誊录制度的争论，实质上是对科举取士标准和考核内容的商榷，反映了部分大臣对科举取士“唯分数”与“兼顾德行”的不同意见。

北宋中叶，关于是否“唯分数”取人的争论还延伸到科举存废的问题。针对有人提出应恢复察举、实行全面考察德行的办法，苏轼在《议学校贡举状》中极力为科举辩护，认为科举考试有一定标准，远远优于无客观标准的察举德行，“夫欲兴德行，在于君子修身以格物，审好恶以表俗……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，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。”因为察举制主要考核德行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，只能通过举子的言行考察。但这一考察很难全面，且德行考核被赋予功利性时，容易促使举子迎合上意，弄虚作假。在苏轼看来，主张废除科举、恢复察举者，只看到了考察德行的优势，却忽视了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，因而他坚定地站在具有客观标准、“唯分数”取士的科举制一方。

这次争论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三次科举存废之争，也是历代关于考试利弊、是否坚持采用“唯分数”录取的最著名的一次争论。由于苏轼的反驳有理有据，故没有人再直接进行辩驳。

林语堂说：世上，多少“生活所需的一切，不贵豪华，贵简洁；不贵富丽，贵高雅；不贵昂贵，贵合适。”合适，是一个人的向往着豪华、富丽、昂贵，可又有多少人琢磨过，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自己适合的生活。先贤所言，我辈当思量，不要在拧巴中荒废时日，一生寻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生活。

## 科举时代的「唯分数」争论

狄永

## 爱书并受益终生

胡荣华

沈从文爱读书，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直至晚年。可以说，书陪伴并影响了她的一生。

对于大众推崇的经典著作，沈从文是持保留意见的。他认为有些经典著作虽然是所谓的“好书”，但只是在道德感、价值观方面没有瑕疵，从趣味性而言是乏善可陈的。关于书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对个人成长产生影响，沈从文觉得应该是在一个人出于自愿、即兴选择读书的时候。他说，这样才会“对书发生浓厚兴趣，且受那些书影响”。

一些有用有趣的书籍首先勾起了少年沈从文对阅读的兴趣。第一是几本有实用价值的医书。从这些书中，